

与兽同在

一位博物学家的野外考察手记

(美) 乔治·夏勒 著 焦晓菊 译 肖峻峰 审



A Naturalist and
Other Beasts



A Naturalist and Other Beasts

(美) 乔治·夏勒 著 焦晓菊 译 肖峻峰 审

一位博物学家的野外考察手记

与兽同在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兽同在: 一位博物学家的野外考察手记 / (美)夏勒著; 焦晓菊译.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355-7689-7

I. ①与… II. ①夏… ②焦… III. ①野生动物—科学考察—文集

IV. ①Q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5198号

湖南教育出版社享有本书中文版全球独家出版发行权

著作权登记号: 18-2011-06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pyright © 2007 by George B. Schaller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Sierra Club Books, San Francisco

All rights reserved

与兽同在

一位博物学家的野外考察手记

(美) 乔治·夏勒 著

焦晓菊 译 肖峻峰 审

责任编辑: 阮林

责任校对: 张征 刘萍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网址: <http://www.hnepb.com>

电子邮箱: postmaster@hnepb.com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10×1000 16开 印张: 15 字数: 300 000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55-7689-7

定价: 58.0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致 谢

我希望在此向这些年来接待我的所有国家，向众多与我合作，在野外热情帮助和款待过我的当地组织、科学家、官员、村民、牧民以及其他，表示最深挚的谢意。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简称 WCS）资助了本书讲述的许多保护项目；此外，美国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丽兹·克莱本和阿特·奥坦伯格基金会（Liz Claiborne-Art Ortenberg Foundation）、萨克让那基金会（Sacharuna Foundation）、阿芒德·厄泼夫基金会（Armand Erpf Fund）和其他资助者的慷慨支持也让我的野外考察和研究工作得以开展。我还要感谢山地俱乐部出版社（Sierra Club Books）的编辑戴安娜·兰多在整理编辑原稿时所付出的努力。

想对他人有益，必须着手于细枝末节。大体不错是无赖、伪君子和马屁精的托词；因为艺术和科学只存在于组织精密的细节之中。

——威廉·布莱克：《耶路撒冷》第3章



在人与动物、花朵等自然创造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一种伟大的准则，至今罕有人知，但终会人所共知。

——维克多·雨果



如若你心意正直，则万事万物都是你了解生命的镜子，也是一本记录神圣学说的书籍。

——坎普滕的托马斯，1427年

前言：奇迹与回忆

有人说，博物学家退休后，就会撰写序言、发表回忆录。我并不是为了追溯往昔而出版这部文选，我的兴趣在于未来。事实上，写下这篇前言的草稿时，我正在阿富汗北部的群山之间做马可波罗盘羊调查，以促进对这一物种的保护工作。自1952年以来，我就在许多国家漫游，自得其乐地观察动物，并努力使它们免受威胁。而这是世界上所有荒野生物都面临的残酷现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生活在梦想王国里，总在想象中搜寻着一些地方。在那里，我可以维护所有生命的利益，帮助保护生命的多样性，当然也包括当地居民，他们的未来也取决于健康的环境。正如一句中国谚语所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的未来取决于今天的行动。

出于偶然机遇，我加入了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前身为纽约动物学会），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从1895年起，学会就开始倡导野生生物保护。它的愿景就是我的理想，这使野外考察工作和自然保护事业成为我的生活，而我成为了荒原、群山与森林中的漫游者。诗人瓦尔特·惠特曼曾问道：“我很久以前就开始追求的东西在哪儿？为什么我还没有找到它？”自然保护事业没有终点。我的内心充满了道义上的责任，要为大自然的美丽与完整而斗争，留住荒野作为永恒的纪念。因此，我选择了一条永无止境的道路，而我能在其中有所作为。于是，现在已经70多岁的我，仍在努力保护某种东西，它比我的生命更持久。我努力在某些关乎动物安危的事情上取得点小成绩，无论是伊朗最后的亚洲猎

豹，还是蒙古东部草原上大迁徙的黄羊。

约翰·C·弗里蒙特在1840年横跨北美洲之后写道：“这里是纯粹的荒野，尚无人探索。未受侵扰的寂静激起人的好奇心，吸引人去探究一番。”我的精神就驻留在这样的地方。幸运的是，重要的荒野遗迹尚存，一处是坦桑尼亚的塞伦盖提大草原和林地，我和妻子凯伊及两个年幼的儿子曾在那里待了3年，这或许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另一处是中国西藏广袤而奇妙的羌塘高原，那里生活着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和其他野生动物，我有20年的光阴倾注在这片土地上。

激情和职业引领我来到许多地方，我是心怀同情的闯入者，四处开展研究，与当地的科学家、官员以及政府合作，收集自然保护必不可少的各种详细信息，这样我就能倡导并激励保护这些国家的自然遗产——荒野碎片。很久以前，我就明白，自然保护没有永恒的胜利，研究者必须与那些摄人心魄的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持各种联系，持续关注它们，使它们免遭毁灭的命运，如山地大猩猩、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动物。有时别人问我：既然这个世界遭受着前所未有的伤害，到处伤痕累累，你也满腹悲观，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放弃？我的回答是：自然保护是我的生命，我必须保持希望。

不过，这部文集主要讲述的是动物，而不是复杂的保护问题。我最大的乐趣是，静静地观察，甚至仅仅是调查动物的踪迹、觅食地点以及它经过后留下的其他东西，记录它的日常生活。我喜欢写下自己在探索中的所见所闻，揭示其他物种的精妙之处，为它们立传。当然，我无从进入一只水豚的思想和欲望，但我至少可记录它生活的丰富性，为我有条不紊的科学研究添加直觉与感情色彩。

我从自己发表的数十篇文章和出版的多部书籍中，挑选出19个故事汇编成集。这些故事主要涉及我在世界各地研究的动物，或是激起我好奇心的动物，有几个故事涉及整个栖息地。这些文章记录了跨越了半个世纪的野外工作，有些具体信息可能已经过时。（每篇文章末尾给出了首次发表或出版的日期。）我在每章前的介绍中，添加了一些当前的



图1 中国卧龙保护区：熊猫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吃竹子。

信息，并在必要之处对原文略加编辑或注释。

从章节的排序可以看出，尽管我始终如一地强调自然历史，但我的工作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不再花数年时间研究一个物种，而是寻找那些忽视自然保护的国家，希望为那里的保护工作带来重大改变。最近我正致力于伊朗、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保护工作。我的使命也扩大到生态系统保护，包括关注影响生态系统的人类文化。

我的许多研究都建立在那些让我产生兴趣的科学问题上，这些问题可能十分重要，也可能无足轻重。如狮子的捕猎对猎物种群有何影响？从岩羊的行为判断，它跟山羊还是绵羊的亲缘关系更近？但我并非总是出于逻辑推理，按照计划做项目。这种抽象能力在人类进化史上还是新事物，而情感在我们头脑中则亘古久远。我对喜马拉雅山的强烈向往吸引我前去，到了那里，我才把研究雪豹当做目标。老虎的威武优雅和大熊猫的视觉魅力会激发人们更深的情感，这种情感能将我们与其他动物联系起来，让人渴望超越枯燥的统计数字，更深入地了解它们。我无法做个超然的观察者，我首先要感觉自己热爱某种动物或某个地方，然后

才会花多年时间研究它们。通常情况下，工作的环境都非常艰苦。并非本书描述的所有研究对象都能激起这种反应，有时我遇到一些动物，比如说羚牛，我只是暂时走近它们的生活，但那也能带来许多快乐的瞬间，值得与人分享。

我很幸运，在野生动物研究的黄金时代，也就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末，参与了这些工作。那时，许多大型哺乳动物首次成为深入研究的焦点，包括像大象和美洲豹这些人们熟悉的、蔚为壮观的动物。同样幸运的是，我拥有许多给予我鼓励和机会的导师，其中包括阿拉斯加大学的布里纳·克塞尔、威斯康星大学的约翰·埃姆伦、奥劳斯和玛格丽特·穆里夫妇。我曾在1956年加入穆里夫妇对阿拉斯加地区的野生生物调查，后来那里成为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还有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的威廉·康威。年轻时，我的兴趣就已经十分明确，而这些导师则引导我成为自然的科学探索者，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引导我接受了野生生物和荒野的精神价值。我还有一位不可缺少的伴侣凯伊，从刚果到中国，她在许多项目中协助我做野外工作，与我分享满足与牺牲，并把棚屋和帐篷打理成我们临时的家。

在这个使用电脑模拟和遥感的年代，耐心观察动物或许看起来是过时的乐趣。刚开始时，我是这方面的先驱，随着自然科学焦点的转移，我有时感觉自己还停留在过去。许多大学忽视了自然历史方面的课程，而这种知识是保护工作的基础。它可以提供基本的信息，阐释问题，并提出现实的解决方案。现在，甚至自然保护的用语也改变了。“自然”现在已变成“自然资源”，人们只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它，把它当做一种可以买卖或丢弃的商品，这种事情太常见了。对大自然之美的欣赏、惊奇感以及对其他物种和土地负责的行为规范，现在很少进入官方的环保对话。但我仍然确信，倡导自然保护必须从感情而非仅仅从理智出发。详尽地描绘动物，有助于激发人们关心它们脆弱的未来，铸就人与动物的亲密关系，并告诉人们，动物也有生存权。没有道德价值观的保护事业无法持久。

我在早期研究中那种无忧无虑的痴迷，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对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只要能在地方或国际上产生影响，我都会据理力争，采取行动，无论影响是涉及科学、政治、经济、美学，还是道德、宗教等。这样，我不得不从让我身心愉悦的考察自然历史的野外工作中抽出时间为保护动物及其栖息地呼吁。因此，与我在本文开头时说的话相反，或许，我编撰这本书是为了找回我的记忆，带着怀旧之情浏览我的著作，重温那些宝贵的岁月。

迄今为止，本书描写的动物及其栖息地暂时得以幸存，但我们仍在为它们而奋斗。这些文章其实是记录奇迹，分享回忆。我希望本书能给读者提供一条愉快的纽带，将他们与那些值得保护的生灵、地方联系起来。保护的理由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它们都如此美丽。

序言：野性生物学家

科学家研究大自然不是出于实用目的，而是因为他乐在其中；他乐在其中是因为大自然非常美丽。如果大自然不美，了解它就没有意义，生活也没有了意义……我指的是那种固有的美，它来自于大自然各部分的和谐秩序，只有纯真的心灵能够把握。

——法国数学家儒勒·庞加莱（1854—1912）



当《野生生物保护》杂志（译者注：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所主办的杂志）要求我谈谈自己对“野外生物学家”的理解时，我理所当然地认为热情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毕竟，所有追求都来自我们内心最深处，有时即使是思索自省也无法弄清这样做的原因。同样，对于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不难找到道德理由。哪一样该优先考虑：是对科学和保护事业的潜在裨益，还是自我陶醉的野外生活？在寻找一种个人价值观来解释自己的趣味时，不妨想想德国诗人约翰·弗里德里希·冯·席勒的话：“发自内心的声音，不会让充满期待的灵魂失望。”

你怎样给野外生物学家下定义？或许他或她不会只把荒野之旅视为宜人的休息，或科学的生态旅游。要判断是否货真价实的野外生物学家，或许可以看看此人在野外生活了多长时间。这种人遭受文化冲击不是开始到野外做项目时，而是在回家的时候。要描述这种人，“野性生物学家”一词比“野外生物学家”更确切，有篇文章就曾这样称呼过我。

然而，对野外生物学漫无目的的评说虽无大碍，或许还有点用处，却不能消除电视在观众中培养的那种观念，即我们生物学家往往过着浪漫的冒险生活。事实上，有些项目看起来容易。如研究昏睡的狮子与温和的类人猿，但研究者必须穿过潮湿或荆棘丛生的植被去追踪动物，不分昼夜，长时间不眠不睡。有些动物生性羞涩，喜欢独处，通常在夜间活动，不愿意被人观察。酷暑与严寒对野外生物学家来说是家常便饭，热带疾病是他们的职业威胁，而政治动乱则是令人讨厌的困扰。野外生物学家与城市的舒适生活隔绝，在陌生的文化中，永远是孤零零的侨民，并且过着不稳定的家庭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必须数年如一日地朝着一个难以捉摸的目标努力，而当地合作者往往不愿接受或许也无法理解这种目标。野外生物学家的配偶必须分担这种困难，并且忍受长期的分居生活。而要容忍对方痴迷的事情并不容易。

我们的大多数研究都很平凡、枯燥，只是反复记录各种事实。对野外生物学家来说，耐心是比智力更可贵的品质。野外生物学家必须甘愿



图2 1977年，当我在巴西的潘达诺大沼泽研究美洲豹期间，这只白唇西猫成了我的宠物。（凯伊·夏勒摄）

等待：等待动物出现，等待雨雪消停，等待脚夫到来。此外还有渴望取得成就的压力：不管你面对什么问题，都必须证明别人对你的项目给予的经济支持具有价值。而且你还一直处于竞争之中：和你自己竞争，也和之前所有既定的优秀标准竞争。冒险很少。即便有，往往也是因为运气不好、计划不周或粗心大意。事实上，对野外生物学家最大威胁不是遭遇凶猛的野兽和危险的地形，而是来自文明社会舒适生活的诱惑。

博物学家威廉·毕彼说过：“在我们把自己假想为鹬鸟、蚂蚁、银鲈或鲑鱼后，我们虽有偏见但尚有几分谦卑的头脑也许能荣幸地获得些许知识。”但如今，为所研究动物的命运的担忧与内疚使研究笼罩着阴影。好奇中夹杂着同情，这预示着我们将成为伊甸园末日的见证者。

那么，野外工作的魅力何在？难道野外生物学家都是患有科学受虐癖的怪人？我只能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小时候，我喜欢收集鸟蛋，我的小型动物园里有蝶螈、蛇、负鼠和其他动物，我也喜欢在乡村游荡。后来，在我到阿拉斯加大学念本科期间，我发现自己童年时的活动可以发展为成年人的合法消遣。我选择这所大学的一个原因是它地处荒野。我认为，在野外生物学家身上，对自然世界的好奇是天生的。我说的不是实验生物学家对抽象知识的好奇，他们把动物用做工具来阐明某些概念。我说的是珍爱动物本身的一种情感投入，而这种与动物之间的亲密感同时也充实着我们自己。对我而言，野外工作不是职业，而是我存在的意义。

每个保护项目都源于一个值得解答的科学问题，一个值得实现的目标。好的研究者需要有了解真理的激情、情感投入，以及探求超越知识局限的强烈愿望。20世纪50年代，当我开始野外工作时，人们认为，研究一个物种，一年的时间足矣。现在的看法是，理想的研究至少包括动物正常的一生，比如研究狮子大概要15年，大象要50年。然而，不管我对一种动物的研究有多着迷，大约3年之后，我的精神就会躁动不安，开始寻求新的目标，努力开创新的领域。我为此找到的合理解释是，其他动物对世界的理解与我们如此不同，令人难以想象，关于它



图3 1991年，凯伊和我重游维龙加火山。1959—1960年，我们在研究山地大猩猩时曾在此居住。图为维索科山顶峰。

们，我只能记录最基本的事实。但我还是有一段时间可以关注这些动物。尽管我的研究报告有限，但我发现，首次描述一个物种的新事实，一份书面的生活史，尤其是当我也能传达发现带来的喜悦以及一种新见解带来的愉快时，我都会感到深深的满足。

与动物打交道，我不仅追求知识经验，也追求审美体验。我研究的一些物种，如山地大猩猩、老虎、大熊猫，都具有如此超群的美，接近它们简直就是一种感官享受。通过照片与文字，客观的视觉印象便与主观感觉融合起来。尽管照片往往只能唤起当时的情感，将那些引发美感、激起同情的场面理想化，但如果它们发挥自己的最大威力，就能创造一种让观看者与观看对象融为一体的和谐，在我们与雪豹或蝴蝶之间形成一条纽带，这种效果仅凭口语是达不到的。笔和镜头是对抗遗忘的有力武器，可帮助物种生存，或者在物种消逝后充当纪念。

另一个癖好决定了我的研究对象和地点：我既喜欢探索知识王国，也喜欢探索物质世界。越是珍稀、偏远的物种，要成为其生活的记录

者，面临的挑战也越大。我感觉自己像 19 世纪的漫游者，做着捉摸不定、逃避尘世的探索，只是带着科学的偏好罢了。无论是穿越青藏高原，我们的驼队孤零零地消失在天地之间，还是跟随一队脚夫，穿行在雨林神秘莫测的寂静中，都会产生寻幽探古的愉悦。有时我会被贴上厌恶人类的标签，因为我常常在这样的探险中回避科学考察队的欢乐气氛。除了妻子凯伊和两个儿子，与其他人我只愿相处片刻。

若干年前，作家彼得·弗莱明曾说过：“如今，旅行的问题在于旅行容易而找理由踏上旅程却很难。”现在，自然保护可以提供充足的理由。开始时，我是出于好奇而研究动物。但是，谁要看到荒野遭受的破坏呈指数式增长，都必定会成为环保倡导者。保存美的遗迹成为理想，直至占据全部心灵，最终成为信仰。我很幸运，我最早的野外考察向我灌输了这样的认识：需要在做科学研究时考虑各种物种的生存。例如，1956 年，我曾陪同奥劳斯和玛格丽特·穆里夫妇对美国最后的大片荒野做生物学调查，通过他们的努力，那个地区很快成为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见下文）。在那些年里，我逐渐从生物学家转变为保护生物学家。研究强化了我作为生态传教士的角色，我的目的是获得知识，同时采取行动。

自然保护是社会和政治问题，不是科学问题。然而，人们习惯上总希望生物学家去解决这些问题。搞研究很容易，坚定不移地做保护却并非易事。因为自然保护无法自上而下强制实施，而必须以当地的利益、技能和习俗为基础。野外生物学家必须与当地居民和机构合作，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建立自然保护区往往会制造敌意，因为当地人会失去土地，无法采集薪柴、狩猎和放牧。自然保护必须考虑本地人的传统生活。不幸的是，用道德要求大家来支持保护很少能成功，正如你与砍掉最后一棵树当柴烧的人没法讨论保护理念。这些理念必须巧妙地融于实例之中。环境问题很少是一目了然的，它们往往涉及道德上的不确定性。我接受的教育让我成为生物学家，但我同时也必须是教育者、外交人员、筹资者、政治家、人类学者……难怪我寻求荒僻之地，与社会方

面的障碍相比，身体面临的障碍微不足道。

环境破坏永远不会停止，甚至在一个真正的道德社会中也不可能。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环保运动的“圣杯”，但它也无法挽救许多人视为最珍贵的东西——那些未开发的、没有受到贪欲影响的荒野碎片。在这里，我们能体验到生命平静的律动，重新感觉到自己属于自然世界。荒野是一种心境，它属于我们的过去，未来的人们是否会对它有丝毫怀念？他们也许会远离野外，但他们应该有瞥见大自然昔日光辉的权利。

我们都在为实现个人的价值而努力，我现在渴望一种超越科学的理想：帮助那些荒野碎片永存。

【1992 年】

献给我的儿子埃里克和马克

纪念我们在野外考察中共享的美好时光